

温德尔·贝里边耕边写六十年： 在“被遗忘”的土地上写作

□王文韬 余 军

2026年8月31日,当代美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温德尔·贝里(Wendell Berry)在肯塔基州罗伊尔港的家中安然辞世,享年92岁。就在去世前一个月,他还在《哈泼斯》杂志上发表长文《少即足矣》(*Less Is Enough*),为自己最重要的散文集撰写五十周年回顾。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生态和重农文学写作者之一,贝里曾获杰斐逊人文讲座奖与美国国家人文奖章。他一生著作等身,出版诗歌、小说、散文逾50部,为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乡村写下了一部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史。

1934年,贝里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,他在肯塔基州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,赴斯坦福大学研修创意写作,此后任教于纽约大学,并在美国出版业和文坛的中心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学术位置。然而,在1964年,三十岁的贝里做出了一个令同行震惊的决定:辞去纽约大学教职,携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肯塔基乡间,在罗伊尔港附近购入一处名为“兰氏码头”的农场,用挽马代替拖拉机耕地。在纽约文学圈看来,这无异于“知识分子的死亡”,但贝里日后在散文集《堆柴木的技艺》中回忆道,他此生最大的幸运便是“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和重农文化在家乡存续了整个童年”。此后六十余年,他再未离开家乡,边耕边写,用余生兑现了年轻时的选择。

“我们栖居于农耕”

1977年,贝里出版散文集《美国的不安:文化与农业》,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思想界的位置。彼时美国农业部长厄尔·巴兹正向全国农民发出“要么做大,要么出局”的指令,要求开足马力扩大生产——贝里称之为“有史以来给农民最糟糕的建议”。数百万家庭小农场在兼并浪潮中消亡。

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农业工业化浪潮,贝里在书中构建了一组直指问题根源的概念范式:“掠夺者”与“养育者”。他以露天采矿者为掠夺者的原型,以传统农夫为养育者的理想,这样写道:“掠夺者的标准是效率,养育者的标准是关怀……掠夺者向土地索求的,仅仅是如何快速且大量地攫取回报,而养育者却会提出一个更为复杂根深的问题:它能持续承载多少而不被耗竭?”而在更深层面,贝里指出,工业化逻辑的根源在于一种文明性的断裂:“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城市化,我们的身体依然仰赖农耕而活;我们来自大地,也将归于大地。故而,我们栖居于农耕之中,一如我们栖居于

这副血肉之躯。”这句话道出了贝里思考的起点:农业从来不是一个产业门类,而是人与大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。工业化所撕毁的正是这份契约——它许诺用效率换取丰饶,却将农民变成了流水线上可替换的零件,将土壤降格为盛放化学制剂的容器。

散文是贝里的论辩武器,而小说则是他重建正在现实中消逝的乡村共同体的精神庇护所。从1960年出版小说《内森·库尔特》起,贝里以他的故乡亨利县为原型,用半个多世纪构建了一个名为“威廉港镇”(Port William)的虚构小镇——这个系列包含八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,容纳了横跨150余年的数十个人物的生与死、劳作与安息。这一系列作品被评论界视为可与福克纳“约克纳帕塔法”世系相提并论的文学地理,只是贝里的“威廉港镇”少了南方哥特式的暴烈,多了一种对日常劳作近乎虔诚的凝视。

贝里在该系列中最为牵挂的一个命题,是教育与土地的悖论。在2004年出版的小说《汉娜·库尔特》中,叙事者汉娜在生命的暮年回望自己与亡夫在150英亩农场共同耕耘的一生。她和丈夫省吃俭用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,却发现“教育的道路通向远方”,每一代人倾尽所有为下一代铺设的上升阶梯,最终成为离开家乡的传送带。贝里借此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悖论:教育许诺了“一个更好的地方”,但那个地方永远在别处,“更好”的尺度从不属于脚下的土地。一整套以进步为名的发展逻辑,却是在系统性地拔除它所依赖的根基——地方性知识、共同体伦理,以及人对一片土地持久而具体的责任感。

贝里在我国文学界尚未获得与其文学地位匹配的关注度,但他的重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层的契合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揭示的以土地为纽带、以邻里为脉络的社会,正是贝里毕生捍卫的乡村共同体生活。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消逝与贝里笔下肯塔基乡村的衰落,虽隔着太平洋,却遥遥呼应着同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挽歌。

小说《汉娜·库尔特》关于“教育通向远方”的痛切反思,对当代中国读者而言是一种切中肯綮的现实隐喻。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、黄灯의《大地上的亲人》所面对的问题,与贝里半个世纪前的追问如出一辙:当年轻人涌向城市,村庄日渐空心化,那些维系了几代人生活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和伦理纽带,是否还能被修复?贝里终其一生所实践的,是对这一问题最朴素的个体回答:在一小片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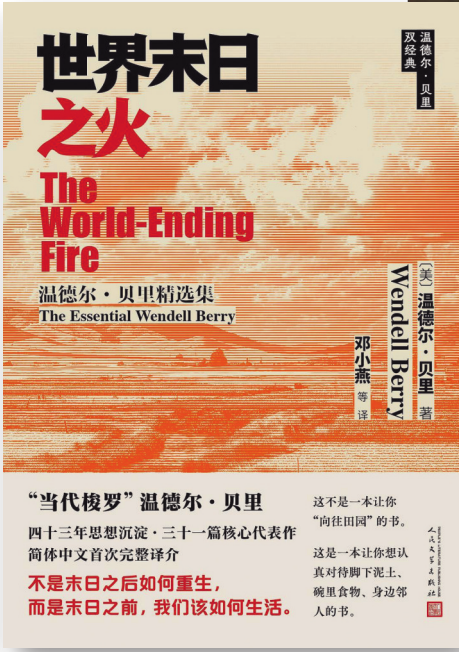


地上,以不耗竭地力的方式耕种,以不割裂社区的方式生活。

“每天做一件无法被计算的事”

1987年,贝里发表短文《我为什么不打算买电脑》,宣称自己用铅笔写作、由妻子唐妮用打字机誊录手稿,他看不出电脑能在这套流程中增添什么价值。文章的真正锋芒不在于贝里对电脑本身的拒绝,贝里指出,技术更新总是以淘汰“旧型号”为前提:“此处的‘旧型号’不仅是我们那台老式皇家标准打字机,更是我的妻子、我的批评者、我最亲密的读者、我的工作搭档。”贝里反对技术迷信,他认为任何一套工作方式的内部都编织着人与人的依存,而效率的每一次升级都可能以这种依存关系的剥离为代价。

贝里的文章《我为什么不打算买电脑》发表后引发论战,读者来信嘲讽他把妻子当“低科技节能设备”。贝里不为所动,以一句极具反叛精神的话回应了所有批评:“如果使用电脑是一个新想法,那么不使用电脑就是一个更新的想法。”时隔近四十年后的今天,细读此文,我们会发现,这篇文章的锋芒不减反增。在人工智能重塑写作、算法介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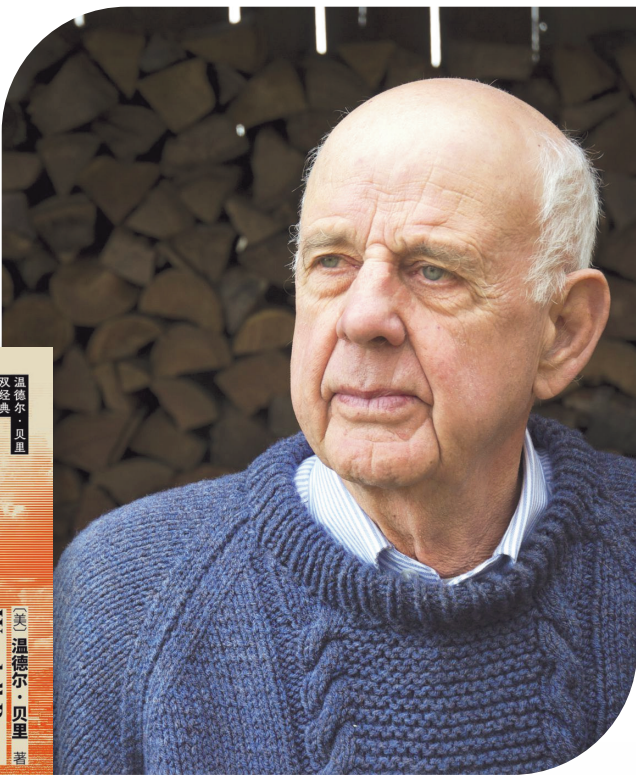


农业决策的今天,贝里的追问依然令人触动。早在1973年的诗作《宣言:疯狂农夫解放阵线》中,他就写下了道出其身体力行、一以贯之信念的诗句——“朋友们,每天做一件无法被计算的事”。

当代美国小说家芭芭拉·金索沃获悉贝里离世的消息后,在社交媒体上悼念贝里:“先知,好农夫,温厚的文学巨人,肯塔基最好的儿子,一切美好事物的朋友。”他一生坚守的命题——人与土地、身体与灵魂的重新联结,在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,具有深切的意义。当代中国正经历的快速城镇化与乡村转型,与贝里笔下二战后美国乡村的凋敝形成了跨时空呼应;他对家庭农场和乡村共同体的毕生捍卫,对理解当代中国的乡土重建议题不无启示。

贝里留在了家族七代人耕种的那片土地上,正如他年轻时所希望的那样。他留下的,不仅是半个世纪以来写就的关于土地与人的著作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证明:一个人可以不做技术世界的造物主,而做土壤坚实的照管者。那些关于自然、劳作与归属的漫长追问,仍在他耕过的每一寸土壤、写下的每一份诗篇中持续回响。

(王文韬系南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,余军系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)



温德尔·贝里(Wendell Berry, 1934.8.5—2026.8.31),美国作家、生态思想家,出生于肯塔基州亨利县。他是小说家、诗人、散文家、农民与环保主义者。先后在肯塔基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,获得文学硕士学位,并曾执教于纽约大学和肯塔基大学。1964年,贝里辞去纽约大学教职,返回肯塔基的祖传农场定居,长期以传统方式务农。2026年8月31日,温德尔·贝里在家中离世,终年92岁。

温德尔·贝里的创作常以书写家庭农场为切入点,批评美国农业企业化,表达新型重农主义与后田园主义主题,代表作包括散文集《美国的不安》与《世界末日之火》等。贝里曾于2010年获颁美国国家人文奖章。2026年7月,其代表作《美国的不安》与《世界末日之火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

■书 讯

《夺回时间》出版

近期,瑞典著名学者马丁·黑格隆德的文集《夺回时间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引进出版。

本书横跨哲学、文学与政治经济学,以锐利而深刻的论证,揭示了一个被长久忽视的真相:唯有承认生命有限,万事万物才真正重要。黑格隆德将这种扎根于脆弱尘世的投入,命名为“世俗信仰”——不是对永恒的乞求,而是在明知终将失去的清醒中,依然倾心投入。他继承黑格尔、马丁·路德·金等人的精神遗产,指出真正的解放在于实现“精神自由”,能够自问反思“我该如何度过有限时间”的生命状态。本书不仅阐述了自省的哲学反思,更是一份行动的展望宣言——夺回时间,就是重获生命的自主权。承认有限,才能在彼此的关怀中,把仅有一次的生命活成目的本身。

《卫报》这样评价这部作品:“这是一部将哲学、精神性与政治学完美融合的雄心之作……万事万物皆取决于我们共同度过的时间。本书字字铿锵,意在唤醒人们时刻铭记这一生命的本真。”

马丁·黑格隆德(Martin Hägglund,1976—),瑞典哲学家、文学评论家,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比尔吉特·鲍德温比较文学、人文学与哲学讲席教授。著有多部作品,包括《渴望时间:普鲁斯特、伍尔夫、纳博科夫》《激进无神论:德里达与生命的时间》等,曾获古根海姆奖、勒内·韦勒克奖等。(刘 玄)

